

面对这种新型儒家人道主义干预思想还存有多少儒家色彩的可能性的质疑,金圣文最后借用孟子的“权行变通之法”为自己正名,并辩称只要不放弃道德德行标准来追求

正当性与合法性,就不会失去儒家思想的精髓。

唐磊、王利/编译

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政治演变

高原明生/文

2017年5月18日,日本外务省下辖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其官网上公布了题为《中国的国内情势与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编写历时两年,其中专门针对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调整、国企改革的推进、机构设置的情况,以及干部任用制度的演变等,逐章做了专题式分析,以期为日本的外交实践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其中,日本当代知名中国研究学者、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承担了“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政治演变”一章的写作,集中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变迁,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改革的侧重点,进而理解干部行动背后的逻辑与动机。我们选取该章节予以编译如下。

自王朝存续时代起,理解中国的关键就离不开“官僚科层制”。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便借鉴了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科层制传统,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构建了一套党领导下的干部选拔任用体系。这套体系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如今不仅在行政部门得以贯彻,还成为高校、国企等非政府机构的运行逻辑和保障,甚至整个社会都被其影响所渗透。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遵循什么样的制度来选拔和任用干部自然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的组织路线,并在实践中常常与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互相联系。本文分析了十六大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变迁,从而考察变化背后的政治

动因。

胡锦涛任内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200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纲要对2001—201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方针原则、改革重点等做了明确规定,提出要在十个方面深化改革。该纲要是根据1995年颁布的“暂行条例”并结合之后中央组织部的诸多改革实践经验制定而成的。2002年出台了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与七年前的“暂行条例”相比,新条例做了细微却重要的调整。具体而言,1995年的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下六项原则:(1)党管干部的原则;(2)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3)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4)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5)民主集中制的原则;(6)依法办事的原则。而2002年的条例虽基本承袭了上述主要精神,但对第二条原则的顺序做了变更,即从“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改为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中共中央公文表述顺序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政策重点的变更。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央组织部看来,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徇私舞弊、任人唯亲仍是妨碍暂行条例公正执行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在干部选拔的具体程序上,虽与暂行条例基本相同,但2002年的条例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如在干部考察环节,要求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的同时还注重考察工

作实绩,并新增了对干部廉洁情况的考察,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问题意识的提升。

根据《条例》,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提出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竞争性原则及一般运行程序,主要适用范围为地方党委、政府部门,以及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的干部选拔。条例出台后,各地、各部门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总的来说分为三类,即“公推公选”、“公推直选”以及竞争性笔试、面试基础上的演说,并经全体党员投票或评委会评分产生。尽管各地在实践中各有调整,但基本的思路是相通的,即改变干部选拔任用中“一把手”的“一言堂”,严格遵循既定的程序和规则,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透明度和竞争性。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印发,自此正式确立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及县以上地方党政领导成员的任期制度,即一届五年、同一个职位最多不超过两届。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更加透明化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在2007和2012年两届党代会召开前数月,党内就中共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预备人选进行了民主推荐。据《人民日报》报道,2017年6月25日,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参加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推荐会议。民主推荐出的人选距离最终名单的形成虽然还要经过组织考察、反复酝酿和多次听取意见,不过投票制度的导入,其出发点是将竞争要素导入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同时也意味着向权力交接制度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胡锦涛任内另一项重要改革是提出选人用人中的“德才兼备”原则。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德与才哪个优先?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对“生产力标准”进行反思,但改革开放时代的组织路线基本是重才的。2008年,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这一变更的背景,正如时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所指出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干部的理想信念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动摇,少数干部群众意识淡漠,放松党性修养,甚至走上腐败堕落之路等。他还明确提出了干部选拔任用中“德”的评价标准,主张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不能单纯依赖投票的得票数、年龄、学历和演说。

习近平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提出选拔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些相对抽象的标准并未涉及干部的竞争性选拔。201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规定》中指出要“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再次强调要按照前述习近平所倡导的五点标准选拔干部。遵循这一改革决定,中共中央在干部管理中强化了党委的领导,不再鼓励公考或公选,干部公选的实践也随之基本终结。这是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

带来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开竞争和选拔干部弱化了党组织对干部的管理权限,且经过“自下而上”投票选出的干部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比一些“自上而下”任命的上级领导拥有更多合法性基础,易在上下级党政机构间造成矛盾。第二,公开的竞争性选拔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繁杂的手续带来高成本,选出的干部上任后的工作成效也未必尽如人意,还有跨地区跨省的“公选”干部“水土不服”而不能团结本地干部等。此外,一些干部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可能将精力和资源用于收买其他干部,导致派阀的产生。第三,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化和考察标准科学化的问题上加强问责。相关学术调查和研究指出,在省级政府以下,GDP、财政收

入等经济指标与干部晋升之间呈现强相关性,但对省一级官员的晋升没有直接作用。习近平推进的反腐败运动,其中一层意义就是要杜绝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

小 结

分析胡锦涛时期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变迁,推动其演变发展的主要动因可谓有三。

其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对效率、可预测、公平、廉洁的要求,不断促进了选人用人制度的公开和透明。然而,以制度化和公开性为目标而导入的各类条例无一不遭遇了实施难的问题,改革也未能彻底消除任人唯亲、人情主义以及买官卖官现象。

其二,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和保持清廉的

政治考量,表现就是不断强化党组织对选人用人的控制权。这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部门维护和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的利益与意向所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挑战也对不断增强党的纪律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时期一方面提出以德为先,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化和公开性,正是对这种必要性的回应。

其三,用人权是党中央最大的执政权之一,习近平时期对选人用人导向与思路的改革以及对党组织控制权的强化,包含了通过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来巩固执政基础的意图。

袁 静/编译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西方主流学者的研判

白洁曦/文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政治视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7年第2期发表题为《中国与国际政治的未来》的书评,梳理和评析了近年来有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七本重要学术专著,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提出思考。这七本专著分别是:(1)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美国著名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Hanlon)所著的《从战略上消除疑虑与确立信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4);(2)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和政治学系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主编的《中国面临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s*, 2015);(3)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所著的《中国梦

的20种愿景》(*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2013);(4)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所著的《中国之挑战: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2015);(5)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史蒂芬·米勒(Steven E. Miller)等人所著的《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中美冲突的风险》(*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2015);(6)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顾问丹尼尔·克莱曼(Daniel Kliman)所著的《命定的转变:民主国家如何应对崛起的大国,从“一战”前夜到中国的崛起?》(*Fateful Transitions: How Democracies Manage Rising Powers, from the*